

## 对聚众犯罪若干问题的探析

余 博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研究生部, 河北 廊坊 065000)

**摘要:** 在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 对聚众犯罪的概念理解各异,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无法科学而准确地定罪量刑。从犯罪主体和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入手, 从根本上厘清聚众犯罪与共同犯罪、集会犯罪之间的区别, 准确界定聚众犯罪的基本定义、范围及适用问题, 有利于促进我国刑法细则的完善, 进一步发挥刑法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聚众犯罪; 刑法细则; 司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 D9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9) 05-0079-06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5.014

### On the Crime Committed by Assembled Crowds

YU Bo

(Department of Postgraduates, China People's Police University, Langfang, Hebei, China 065000)

**Abstract:** I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riminal law in China, the definitions of the crime committed by assembled crowds is variously understood, which leads to the unscientific and inaccurat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in judicial practice. Starting with the criminal subject of and social harmfulness, the differences should be clarified between the crime committed by assembled crowds, the joint crime and the assembly crime for the accurate definition and the scale of the crime committed by assembled crowds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and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criminal law for judicial practice in China.

**Key words:** crime committed by assembled crowds; specific 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 judicial practice

在众多社会问题中, 犯罪问题无疑是最为复杂的。就实施犯罪的参与人数而论, 其实大部分的犯罪基本上由一个人独立进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 对于犯罪的定义基本上都是针对一个人参与实施犯罪这种形式而定的, 换言之, 在刑法中所规定的犯罪属于个体犯罪性质。若某人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之规定, 则可以将其定义为构成犯罪的同时追究其独立的刑事责任。在现实生活很多的刑事案件不止是一个人参与的, 大部分的犯罪都是由多人参与实施的, 尤其是根据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报告显示, 多人参与实施的犯罪越来越多, 且越来越严重, 这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产生了恶劣的影响。<sup>[1]</sup>

多人参与实施的犯罪活动, 相对于一个人独立

实施的犯罪而言, 对社会的危害性更为严重。这是一种由多个独立个人聚集而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形式, 也就是以“聚众”形式来构成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条件或者是法定加重犯罪情节, 这类犯罪对社会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本文以“聚众犯罪”为研究对象, 对前人关于聚众犯罪的研究资料进行总结与分析, 结合我国目前刑法及司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拙见, 以期通过对聚众犯罪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 进一步促进我国的刑法理论研究。<sup>[2]</sup>

### 一、聚众犯罪概述

在各类犯罪形式中聚众犯罪较为常见, 但我国的刑法理论对于聚众犯罪的研究还不够完善, 因而

收稿日期: 2019-03-06

作者简介: 余博 (1989—), 男, 云南丽江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边境管理、公安情报等研究。

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国的刑法体系中最早将“聚众犯罪”作为一个专用术语是出现在《刑法》(1979年)的第86条,在《刑法(修订版)》中的第97条中也对其进行了简单陈述,但并没有对聚众犯罪进行详细的鉴定,因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难度较大。不管是刑法理论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不易正确把握聚众犯罪的本质。因此,需要对聚众犯罪的基本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刑法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以此来明晰关于聚众犯罪的理论思路,进而引导人们在理论范畴内对聚众犯罪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sup>[3]</sup>

### (一) 聚众犯罪的概念与特点

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创立“聚众犯罪”这一概念属于首例,虽然世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体系中有类似“聚众犯罪”性质的相关规定,但是对于“聚众犯罪”的概念却没有一个准确的理论界定。我国的刑法理论中对“聚众犯罪”虽然有了基本的概念雏形,但是却并没有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在我国最新修订的刑法细则中,根据刑事犯罪的法定原则将聚众犯罪归纳为六大类,但对聚众犯罪的概念与实质详细地定义与诠释仍是目前刑法理论研究所缺乏的,在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对于聚众犯罪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

目前,我国的刑法理论研究对于聚众犯罪的定义有以下五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法律层面上对聚众犯罪的规定,其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必须是聚众实施犯罪活动,或者是在相关国家法律中明确规定的以聚众为主要犯罪形态的犯罪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聚众犯罪应该属于一种共同犯罪形式,其犯罪成员是在行为人的组织下将多个人聚集起来而一起实施犯罪活动,其犯罪的构成要件为“聚众”;第三种观点认为:在我国的刑法中所明文规定的以聚众为主要犯罪方式来实施的犯罪活动被称之为聚众犯罪;第四种观点认为:聚众犯罪指的是聚集有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多个单独个人而实施的犯罪,而这些多个人之所以能够聚集以实施犯罪活动,其必定有组织者来组织、策划以及指挥整个犯罪活动;第五种观点认为:聚众犯罪应该包含聚合性,又可将之称之为“聚合犯罪”,其犯罪构成因素主要是以多个人的聚合犯罪行为。<sup>[4]</sup>

上述五种关于聚众犯罪定义的概述均有自己的亮点,但是都没有对聚众犯罪概念的内涵进行合理、周全的概述,如第一种观点将聚众犯罪设定为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形式,但是在实际中聚众犯罪并不全是单一的共同犯罪形式;第二种观点对聚众犯罪所涵盖的范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三种观点对聚众犯罪的法定性以及聚众性都有包含,另外也注意到了加重环节需并存于其犯罪活动中,这种概述相对周全;第四种观点着重强调了“聚众”特性,但是存在扩大聚众犯罪范围之嫌疑,容易将集团犯罪与一般的共同犯罪混淆,进而遏制了理论研究;第五种观点不仅强调了聚众犯罪的法定性,同时又对“聚众”特性进行概述,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忽视了一些加重环节存在于该犯罪活动中,因而也同样缩小了其涵盖的范围。

### (二) 聚众犯罪的类型

在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对于聚众犯罪活动中参与人数的问题(如参与人在整个犯罪活动中所起作用以及其是否部分或全部均构成犯罪)有以下几种阐述:

1. 全部参与聚众犯罪的人均构成犯罪。在我国的《刑法》第317条第2款中,对于聚众持械劫狱罪是这样认定的:对于组织、策划实施聚众持械劫狱或者暴动越狱的犯罪分子以及积极参与犯罪的人,可以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若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时,可判处死刑;对其他参与人员,可视情况严重程度判处3年以上10以下有期徒刑。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对于聚众犯罪中的不同类型的犯罪分子,不管是主要犯罪分子还是其他参与人都全部构成犯罪事实。在定罪过程中,不会过多关注犯罪分子在整个犯罪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问题,只会对其量刑中进行适当的考虑。<sup>[5]</sup>

2. 对于组织、策划并积极参与聚众犯罪的人构成犯罪,但对于一般参与者则不构成犯罪的聚众犯罪。在我国《刑法》规定中的对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认定,在《刑法》第290条中规定:若犯罪分子聚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其造成的情节较为严重时,如:对正常的生产、工作、学习以及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影响,导致其无法正常开展时,对于组织、策划的犯罪分子需处以3年至7年的有

期徒刑，对于其他次要参与分子可处以管制、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剥夺其政治权利等处罚。而在《刑法》第292条中对于聚众犯罪的表述中，除了上述规定以外，对于多次聚众斗殴的；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持械聚众斗殴的。这四种特殊情形下组织、策划的犯罪分子以及积极参与者均处以3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的处罚。从上述的两条刑法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的《刑法》中认定聚众犯罪的组织者及积极参与者构成犯罪，而对于一般的参与者则未将其认定为犯罪因而免于刑事处罚。

3. 对聚众犯罪活动中的组织策划者被认定为犯罪，而其余参与者则不认定为犯罪的聚众犯罪。在我国的《刑法》中第291条规定：对于组织策划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公共场所秩序罪（如：聚众扰乱民用航空站、客运车站、码头、公园、商场、影剧院或者破坏交通设施，阻碍或者暴力抗拒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可根据其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对于组织策划者可处以拘役、管制或者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处罚。在此类犯罪活动中只认定组织策划者构成犯罪，而对于其它参与者则认定不构成犯罪。<sup>[6]</sup>

## 二、聚众犯罪与相关范畴的关系

在进行刑法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理清聚众犯罪与相关范畴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积极指导刑法理论研究，使其能够对犯罪进行科学地定罪量刑，对我国实施科学化司法实践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聚众犯罪与共同犯罪之间的关系

聚众犯罪，属于群体性暴力犯罪类型，其主要是在首要犯罪分子的组织、策划以及指挥下纠结多人而实施的暴力犯罪活动。对于在聚众犯罪的行为表现形式上与共同犯罪之间应该是属于具体与一般的关系，但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对我国《刑法》相关规定的深入分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法律上聚众犯罪应该是隶属于共同犯罪的，而且其必要共犯应该具备必要共

犯、对向犯、集团犯这三种法律表现形式；第二种观点认为：对于聚众犯罪，应该将其分为聚众共同犯罪和单独犯罪，只有犯罪活动是共同参与的才能将其认定为必要共犯；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属于单独犯罪的聚众犯罪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共同犯罪范畴之内，但是对于聚众共同犯罪并不一定是必要犯罪。在我国的刑法中对此的规定中还列举了可能存在任意共犯的情况，例如：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个案只处理了其首要犯罪分子情况时，若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首要犯罪分子时便构成了任意共犯情形。此类情形在一些具体案例中并不是全部为多个首要犯罪分子共同实施的犯罪活动，还会出现单独或者多个首要犯罪分子来组织策划聚众犯罪活动这两种情况。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比较认同第三种观点，在这一观点中不仅适宜必要共犯和任意共犯这两个概念，同时还将聚众犯罪科学应用于刑法理论研究中，使得人们对于聚众犯罪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sup>[7]</sup>

### （二）聚众犯罪与群众示威、游行、集会犯罪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研究中对于聚众犯罪与群众示威、游行以及集会犯罪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不同方向的阐述。

#### 1. 聚众破坏、群众示威、游行以及集会罪

在我国《刑法》中设立该罪的目的是为了依法保护示威、游行以及集会的正常秩序以及尊重公民所享有的政治自由的合法权利。在开展示威、游行以及集会中，由于参与人数较多，若发生破坏活动则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使得公共场所、道路交通等的秩序失去控制，因而对于此类破坏行为应该将其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相同处罚，但不能直接将其纳入聚众犯罪范畴，其原因就在于破坏活动并不是以聚众的形式而实施的，也有可能是个人单独实施的，加之该罪的法律条文结构不具备聚众犯罪的特性，因而只能将其定义为单独犯罪。<sup>[8]</sup>

#### 2. 非法示威、游行、集会罪

非法示威、游行、集会等，本身已具备聚众犯罪的特征，因而应该属于聚众犯罪的范围。具体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方面，在实施示威、游行、集会时，必须要有组织、策划以及指挥者，就这个性质

而言,就已经具备了聚众的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组织、策划及指挥非法示威、游行、集会的主要人员需要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而其余的参与者不构成犯罪条件。上述两种特征均符合我国《刑法》中关于认定聚众犯罪的特征,唯一不同的是,依据《刑法》聚众犯罪中必须要有首要分子及积极参与者,而此处只不过调换了聚众犯罪的基础概念,其性质完全符合聚众犯罪。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对聚众犯罪的立法进行科学的统一,尤其是将一些称谓进行有效的统一,并进一步明确聚众犯罪的行为,才能更好地凸显司法的严谨性。

### 三、聚众犯罪的性质

随着人们对于聚众犯罪的研究不断深入,逐渐明晰关于聚众犯罪的一些基本定义、范畴等相关内容,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具体的聚众犯罪认定以及刑法适用问题等却时常陷入困境,进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未合理应用适用法律的问题。

#### (一) 聚众犯罪之危害国家安全罪

在我国《刑法》中,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有五种犯罪可以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聚众犯罪,即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我国,这五种罪名是属于集团犯罪抑或是聚众犯罪,刑法理论上却鲜有论及。<sup>[9]</sup>

##### 1.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分裂国家罪

在我国《刑法》的第 103 条第 2 款以及第 105 条第 2 款中均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分裂国家罪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对于首要分子可以处以 5 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对于参与者可处以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管制、拘役以及剥夺政治权利等处罚。上述两条规定中均有“首要分子”这一概念。正如前文分析,若在刑法分则的规定中出现“首要分子”这一概念时,这就意味着已经构成了聚众犯罪或者集团犯罪事实。

##### 2. 参与暴乱、武装叛乱、分裂国家罪

在我国 1979 年修订的《刑法》中就有关于“组织、领导、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的规定,但是立法者并没有将分裂国家,武装叛乱、暴乱,颠覆国家政权等行为规定为集团性犯罪。但是从我国现

行的刑法中对于参与暴乱、武装叛乱、分裂国家罪的论述来分析,其已经并列了“组织”“策划”与“实施”三个行为,同时还出现了“首要分子”概念,再加之组织、策划与实施三个行为均为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内容,其应属于实际行为。

#### (二) 聚众犯罪之扰乱公共秩序罪

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的侵犯主体是正常的社会秩序,由于此类聚众犯罪所发生的场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极易引起极其恶劣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在大陆法系中都是将此类犯罪称之为“骚乱罪”。

##### 1. 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公共场所秩序罪

在我国《刑法》第 291 条中规定:聚众扰乱民用航空站、客运车站、码头、公园、商场、影剧院或者破坏交通设施,阻碍或者暴力抗拒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在对首要分子进行量刑时根据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可判处管制、拘役或者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对于聚众犯罪的严重程度的评定具有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前文已对如何衡量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问题进行了论述,主要标准有:犯罪动机的卑劣程度、参与人数、犯罪持续时间、行为手段、造成的结果与影响以及损失的程度等方面来进行综合考量。

##### 2.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在我国《刑法》第 290 条第 1 款对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组织指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导致人们的正常生产、工作等无法继续进行,以及由此引起的严重经济损失的犯罪行为。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侵犯的客体应该是社会管理秩序,聚众扰乱的社会执行犯罪行为针对的是单位,而不能是个人。也就是说:虽然其行为侵犯的是个人利益,但其危害性尚未触及刑法就不能予以刑法惩治。若在聚众实施扰乱社会秩序时,犯罪分子同时还触犯了其他罪名时,则根据相关牵连犯的原则择重处理。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均为情节犯,这两种罪行的区别就在于聚众扰乱行为发生场所的不同。<sup>[10]</sup>

### 四、我国聚众犯罪的立法缺陷以及完善措施

在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中,均对聚众犯罪

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聚众犯罪属较大类型的犯罪形式，但是在立法方面却没有对聚众犯罪有准确的界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聚众犯罪与一般的共同犯罪以及犯罪集团，主要犯罪人与首要分子之间的关系较为模糊。因此，本文针对聚众犯罪在立法方面的不足之处进行初步分析和研究，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

### （一）完善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制度

#### 1. 健全“聚众犯罪”的法定概念

目前的刑法理论研究对于聚众犯罪的概念存在较大争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困难重重。笔者将前人对于聚众犯罪的研究资料进行总结与分析，结合我国目前刑法及司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对聚众犯罪的定义提出以下建议：

（1）有效区分聚众犯罪与一般共同犯罪、犯罪集团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三者应该是属于并列关系，在现行的刑法中对一般共同犯罪、犯罪集团都有明确的定义，使得在司法实践中不易混淆，但是对于聚众犯罪的定义却没有明确的理论界定，因此，建议从形式和内容上来完善我国刑法和立法中聚众犯罪的法定概念。

（2）在我国的《刑法》总则中，尤其是在1997年修订版中对聚众犯罪进行了规定，将聚众犯罪定义为个罪。聚众犯罪属于较大类型的犯罪形态，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术语，在刑法总则中需准确界定聚众犯罪的定义，这不仅有利于总则指导分则，同时还使得我国的刑法理论更为系统与完整。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刑法立法中很有必要建立健全聚众犯罪的法定概念，其内容可以参考《刑法》第97条中的：“本法中的首要分子，主要是指在聚众犯罪中或者在犯罪集团起到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成员。而本法中的聚众犯罪，主要是指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以聚众的主要行为方式而实施犯罪的活动”。

#### 2. 完善刑法分则，明确聚众犯罪责任主体

在对聚众犯罪进行立法时需将法定责任主体贯穿其中，也就是说在修订刑法分则时需对聚众犯罪的责任主体进行准确的界定，需明确指出首要分子或者是其他种类的参与者。但是目前的刑法条例中并没有明确界定首要分子，例如在《刑法》中的第237条、第289条、第292条第2款、第303条

以及第315条中均未对聚众犯罪中的主体责任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考量犯罪责任主体的处罚时就显得较为困难。我国现行的刑法规则中并没有对聚众犯罪的责任主体进行明确定义，因而，笔者认为需要对现行的刑法中聚众犯罪的责任主体进一步明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由于聚众犯罪的责任主体在刑法分则中没有明确的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研究存在着较大分歧。即便是同一类型的司法案件，由于在实践中对相关条文理解的不统一，在量刑过程中也体现出较大差异性。因此，笔者建议在上述刑法分则中需进一步明确聚众犯罪的责任主体问题，有效健全我国的刑事立法。<sup>[10]</sup>

### （二）完善我国聚众犯罪的刑事司法

准确、完备的刑法立法为科学司法实践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司法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还可以反过来弥补刑法立法的缺陷，促进立法系统的完整。而当刑法立法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进一步完善司法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因此，为了有效推进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健全聚众犯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

#### 1. 建立健全案例指导制度

我国法律在制定过程中深受大陆法系影响，在理论研究以及立法过程中关注的焦点并非案例的法律效力问题，又因相关立法不足以及司法解释不具体等问题，已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制的整体发展进程。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需积极发挥案例的辅助作用与功能，以此有效弥补在我国立法上的不足。

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纲要》中对此已有明确指示：“从2000年开始，只有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决定具有适用法律问题的典型案件可以予以公布，下级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可以参考其处理方法。”而在之后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中又再次进行了强调：“进一步建立健全案例指导制度，尤其是要重视部分具有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适应性以及进一步发展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而具体的指导性案例在编选标准、编选程序、发布方式以及指导规则等方面具体是由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来负责制定。”从上述文件中我们可以看

到,目前我国正在逐渐形成有别于英美法系法律制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司法实践制度。

从上述相关文件内容上来看,对于部分法院在执行案例指导制度时误用相关聚众犯罪条文的问题,现已将相关标准全部由最高人民法院来统一进行审核与制定,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进行公布,而各级法院在审理相关聚众犯罪案件时可以参考指导性案例来进行审判,统一的适应标准在完善我国相关司法制度方面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 2. 进一步强化司法解释工作

对于刑事司法解释的定义,也就是“两高”(“两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简称)阐释关于我国刑事法律规范的基本涵义。在我国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对此便有规定:“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对所有法院审批过程中所应用到的各种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若对于某一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存在原则性的分歧时,可以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者决定。”

我们从上述规定中可解读出目前我国司法解释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其一,进行司法解释的主体必须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其二,司法解释的效力具有普遍效力,其中对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检察和审判工作均具有相应的效力;其三,司法解释的范围只是限制于在司法实践中的审判与检察工作中所应用到了的具体法律、法令问题。通过刑事司法解释,使其在指导司法实践、准确实施法律,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再加之其具有权威性、及时性、准确性以及操作性强等特性,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相关法律、统一司法人员认识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目前,我国的聚众犯罪的刑事立法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有关具体适用法律、法令等问题均没有准确的规定,例如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聚众犯罪的相关条文中,对于“组织”“策动”“实施”“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损失的”等的具体定义均未作出详细的解释,这些都需要我国最高司法机构通过司法解释来予以明确,这样将有利于下级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准确执行相关法律法规。<sup>[11]</sup>

## 五、结语

在我国的《刑法》规定中已明确聚众犯罪属于是聚众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初犯刑律的犯罪事实。在刑事责任中聚众犯罪的主体范围可大致分为以下三大类,即全部参加者、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首要分子。聚众犯罪有别于共同犯罪的原因就在于案件中的首要分子、积极参与者以及参与者与共同犯罪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的聚众犯罪都涉及实行过限的问题,仅针对具有共同犯罪特征的聚众犯罪活动。

目前,在我国的刑法立法中对于聚众犯罪问题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对于聚众犯罪的定义还不够完善;二是对聚众犯罪的刑事责任主体认定不够明确;三是对于部分聚众犯罪活动的定罪量刑不够科学。若要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那就需要利用立法程序来进一步准确界定聚众犯罪的法律定义、内涵及其外延,明确聚众犯罪的责任主体以及对聚众犯罪活动进行科学化定罪量刑。

## 〔参考文献〕

- [1] 王作富. 刑法分则实务研究 [M].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0: 2.
- [2] 李晓明. 中国刑法基本原理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3.
- [3] 马虹, 梁云. 聚众斗殴转化犯司法认定 [J].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9 (1): 26.
- [4] 常青. 聚众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D]. 长春: 吉林大学, 2006.
- [5] 牛晓鹏. 对聚众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J]. 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2): 17.
- [6] 彭辅顺. 聚众犯罪的立法检讨与改进 [D]. 济南: 山东警察学院, 2010.
- [7] 曹坚. 聚众斗殴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D]. 广州: 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 2006.
- [8] 叶良芳. 实行过限之构成及其判定标准 [J]. 法律科学, 2008 (1): 89.
- [9] 牛晓. 对聚众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D]. 长沙: 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2005.
- [10] 陈兴良.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 [J]. 法学杂志, 2006 (1): 21.
- [11] 何俊. 聚众犯罪的分类及其特征分析 [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5 (9): 144-146.